

中國歷史大事紀年

辽宁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編

前　　言

为了配合我系函授部和本科历史教学，帮助函授学员和本科学生学习中国历史，在系领导的指导下，我们编写了这部《中国历史大事纪年》。编写时，以我系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及《中国现代史》教材为主要依据，并参照了国内兄弟院校编写的有关材料与最新科研成果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等著作。在编写体例上，力求一致；惟根据略古详今原则，近、现代史部分除纪年之外，还系以月日。

学习中国历史时需要经常查阅的一些材料，如朝代世系、年代对照、历代官制、历代度量衡制以及一些统计数字资料等，我们以附录形式汇编于纪年正文之后，便于学员及读者查阅。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编写时间仓卒，书中疏漏、错谬之处，恳望读者同志们批评指正，帮助我们修改完善。

《中国历史大事纪年》编写组 1982.7

目 录

一、中国历史大事纪年

中国古代史	1页
中国近代史	145页
中国现代史	239页

二、附录

历代世系表	355页
夏代世系表	355页
商代世系表	355页
西周世系表	356页
东周世系表	356页
秦世系表	356页
西汉世系表	357页
东汉世系表	357页
三国世系表	357页
西晋世系表	358页
东晋世系表	358页
肥水战前北方各割据王国兴亡表	358页
肥水战后北方各割据王国兴亡表	358页
南朝世系表	359页
北朝世系表	360页
南北朝兴亡表	361页
隋朝世系表	361页
唐朝世系表	361页
五代世系表	361页
辽世系表	362页
北宋世系表	362页
西辽世系表	362页
西夏世系表	363页
金世系表	363页

南宋世系表	363页
蒙古、元世系表	363页
明朝世系表	364页
清朝世系表	364页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简表	365页
中西纪元对照表	366页
中西纪元及回力对照表	406页
历代官职简表	441页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总数、每户平均口数和每户每口平均田亩数表	459页
中国历代度量衡比较表	465页
历代田亩面积比较简表	465页
历代尺的长度比较简表	466页
历代升的容量比较简表	467页
历代斤的重量比较简表	467页
历代尺度比较表	468页
历代量的比较表	468页
南京临时政府及北洋政府总统、总理、部长表	469页
北洋政府各省督军、省长表	477页
中华民国政府总统、部长表	485页
广东大元帅府（大本营）元帅、部长表	485页
广州国民政府委员、部长表	486页
武汉国民政府委员、部长表	486页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简介	487页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487页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487页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487页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488页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488页
“八七”会议	488页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489页
六届四中全会	489页
遵义会议	489页
洛川会议	490页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490页
七届二中全会	491页
七届六中全会	491页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491页
八届三中全会	492页
八大第二次会议	492页
八届六中全会	493页

八届八中全会	493页
八届十一中全会	493页
八届十二中全会	494页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494页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494页
十届三中全会	495页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495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	496页
十一届五中全会	497页
十一届六中全会	497页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498页
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介	500页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500页
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500页
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500页
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500页
各省、市、自治区概况	501页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及分布地区	501页
全国主要城市解放日期表	503页
国民革命军序列表	505页
南昌起义部队序列表	505页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序列表	505页
广州起义部队序列表	506页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序列表	506页
中国工农红军序列表	506页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斗序列暨主官姓名表	507页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斗序列暨主官姓名表	508页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斗序列暨主官姓名表	509页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战斗序列暨主官姓名表	510页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中央分局及十四个地区的部分领导人	510页
中央革命根据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绩	512页
第一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战斗序列暨主官姓名表	512页
第二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战斗序列暨主官姓名表	512页
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战斗序列暨主官姓名表	513页
中国工农红军战绩统计	514页
遵义会议参加人员名单	514页
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名单	515页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战斗序列暨主官姓名表	515页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战斗序列暨主官姓名表（1938年2月）	516页
新四军战斗序列暨主官姓名表	516页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主官姓名	517页
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主官姓名	517页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表	517页
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表	517页
国民党军各战区划分	518页
侵华日军战斗序列表	518页
日本陆军兵力扩充情况	519页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主要战绩统计	519页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兵力逐年增长统计	520页
日军对我根据地分割封锁情况	520页
国民党军围攻解放区兵力一览表	521页
美援蒋军事统计表	523页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523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直属部队	523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兵团战斗序列暨主官姓名表	523页
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参加人员名单	525页
西北战场内线作战初期几个重要战役一览表	525页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绩统计表	526页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期敌我力量对比表	526页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民兵参战人次、战绩统计表	527页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三大战役支援前线统计表	527页
辽沈战役我军战斗序列表	527页
辽沈战役国民党军战斗序列表	527页
淮海战役我军战斗序列表	528页
淮海战役国民党军战斗序列表	528页
平津战役我军战斗序列表	529页
平津战役国民党军战斗序列表	529页

中国历史大事纪年

古代史部分 (远古至公元1840年)

〔原始社会〕 (远古至公元前22世纪)

约170万年前 元谋猿人。

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两枚猿人门齿化石以及炭屑、烧骨等。经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元谋猿人生活的年代约距今170万年左右。

约60万年前 兰田猿人。

兰田猿人遗址，在陕西省兰田县泄湖镇的陈家窝村和公王岭。1963年至1964年间，在该地发现猿人头盖骨、上下颌骨和三颗牙齿的化石以及石片、石核、刮削器等旧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等。兰田人的体质构造还带有较大的原始性：头骨很厚、眉嵴粗壮，额骨低平，脑容量为778·4毫升；但比元谋人有了进步，是正在形成中的原始人类。

约50万年前 北京猿人。

北京猿人是我国远古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原始人类化石之一。北京人的遗骸化石是在1929年从北京市西南的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中发现的。他们生活年代约在距今50万年前。从体质构造上看，北京人的头骨虽然带有明显的原始性：额骨低平，眉嵴粗大，吻部突出，下颏极小并向后收。但是他们的四肢发展较快，上肢骨已和现代人基本相似，下肢也比较接近于现代人，已有了人类特有的股骨脊。他们的脑容量（1,075毫升）只有现代人平均脑量的 $\frac{3}{4}$ 左右，却比类人猿要大一倍多。他们已能打制石器作为工具，并已学会使用火。这一切，说明北京人已基本上具备人类的特征。北京人这种四肢发展较快而头部带有较多原始性的不平衡状态，是由于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身体各部分器官在劳动时担负的功能和强度不同所引起的。手足的分工，使手在劳动中越来越灵巧，下肢也由于支撑身体和直立行走而日益发展了；同时直立行走和在劳动中语言的产生又为大脑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北京人体质构造上的这些特征，雄辩地说明了恩格斯所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这一伟大的真理。

元谋猿人、兰田猿人和北京猿人这些原始人类遗迹的发现，揭开了我国历史的序幕，证明我国是人类发源地之一，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从来就是棲息在中国大地上，驳斥了所谓“西来说”、“南来说”等种种谬论。比北京人晚的原始人类，有大荔人、桐梓人、马坝人等。

约10万年至5万年前 丁村人。

丁村人是在1953至1954年间从山西襄汾县丁村发现的。除了发现三枚原始人类牙齿化石外，还发现大批的石器和动物化石。丁村人的牙齿比北京人细小，而所用石器种类（有砍伐器、刮削器、石球、尖状器等）却要复杂得多，这说明无论在体质构造上或是使用工具上，丁村人都比北京人进步，是属于“古人”阶段的人类化石。比丁村人晚一些的，有麒麟山

人、资阳人、河套人和柳江人等。

约5万至1万年前 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是在1933年从北京附近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中发现的。从出土的人类化石来看，这时人类体质比起丁村人有了更大的进步，颅骨增大，额部隆起，咀巴收缩，下颏突出，牙齿细小，脑容量达1,300—1,500毫升，已具备现代人的基本特征，是属于“新人”阶段的人类。同人类化石同时出土的，还有动物化石、石器以及骨针和石珠、石坠、海蚶壳等装饰品。从丁村人时代氏族萌芽以后，到了山顶洞人时代，从血缘家庭逐渐过渡氏族公社时代。

约6,000—5,000年前 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我国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

“仰韶文化”以1921年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得名，过去因在此发现有特色的“彩陶”，又名“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分布于黄河中游及渭河、汾河、伊水、洛水、卫河流域等处，主要遗址除仰韶村外，还有：西安半坡村、华县泉护村、元君庙、邠县下孟村、临潼姜寨、郑州大河村、河南三门峡、陕县庙底沟、北首岭等处。在这些遗址中，出土大量的石制工具，有磨光的石斧、石铲、石刀、石纺轮、石磨盘、磨棒以及簇、矛、钩、鱼叉、弓箭等，另外还有骨制、木制的工具。这些生产工具多用于农业生产。原始农业的发明，是氏族公社时期的一项重大成就，自此以后，渔猎和采集经济逐渐降居附属的次要地位。原始农业最初操持在妇女手中，出现以妇女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时期。原始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萌芽发展提供了条件。适应定居与熟食的需要，人们发明了陶器，类型多种多样，有瓮、罐之类的容器，灶、甑、釜、鬲之类的灶具和钵、碗、杯、盘之类的食具以及汲水的尖水瓶等。这些陶器大部分是红色或褐色以及红褐相间的彩色，表里光滑，彩绘精美，上面还绘有图案与图画，如鱼纹、蛙纹、人面纹等。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往往有类似文字的刻划，可能是最初人类用以记事的符号，是我国原始文字的萌芽。从各地出土文物中，普遍发现石制或陶制的纺轮和骨针，说明当时已知纺织作衣。

与“仰韶文化”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尚有分布在甘肃、青海、宁夏、四川一带的马家窑文化，分布在长江以南的浙江余姚县河姆渡、广东南海县西樵山、江西万年等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约5,000—4,000年前 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五帝”时代。

“龙山文化”以1928年最初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而得名，过去因在此发现有特色的“黑陶”，故又名“黑陶文化”。“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我国黄河下游和东部沿海一带。这时，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及沿海一带的氏族部落，先后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同“龙山文化”大体相当的，主要有黄河流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得名）、大汶口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得名）、齐家文化（以最早发现于甘肃和政县齐家坪得名）；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湖北京山县屈家岭得名）青莲岗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江苏淮安县青莲岗得名），良渚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浙江杭州良渚程名）等。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男女双方在生产中所处社会地位的变化。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男子在这得生产部门中逐渐上升到主导地位，而妇女则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决定男女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既然男子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他们拥有的财富逐渐增多，家庭私有制也开始产生，因而要求按男系计算血统和父系继承权，以便把财产传给自己的子女。

于是，由不巩固的对偶婚转变为一夫一妻制，父权制终于代替了母权制，从此，妇女降于从属地位，父系大家族随之形成。在父系大家族内部，除了丈夫支配妻子而外，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剩余劳动的出现，还出现了家内奴隶，对外战争的俘虏则成为奴隶的主要来源。在父系大家族的基础上，产生了氏族部落显贵，氏族部落首领逐渐取得支配氏族部落的权力。随着部落内部贫富的分化以及部落联盟的形成和发展，终于使原始社会解体，出现了对立的阶级和阶级国家。

我国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大约与“龙山文化”的时代相当，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时代的历史内容。关于五帝的传说，古史说法不一，《史记》以黄帝（号“轩辕氏”）、颛顼（号“高阳氏”）帝喾（号“高辛氏”）、帝尧（号“陶唐氏”）帝舜（号“有虞氏”）为“五帝”。在黄帝以前，还有太昊（号“伏羲氏”）少昊（号“金天氏”）和炎帝（号“神农氏”）。这些传说中的帝王，被古史宣扬为“生而神灵”、“功高天地”的“圣王”，尤其是黄帝被称为华夏族的始祖。根据古史传说的内容加以分析，这些所谓的帝王，实际上是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时代部落联盟的首领。大概太昊、少昊是黄河下游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炎帝是黄河上、中游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另外在黄河流域下游还有强大的蚩尤部落。他们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掠夺战争，蚩尤部落与炎帝部落大“战于阪泉之野”，炎帝部落被打败，便同和它有姻亲关系的黄帝部落结成联盟，同蚩尤部落大战于“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一带），把蚩尤打得大败。后来黄帝部落又同炎帝部落发生冲突，黄帝取得胜利，成为黄河流域最强大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以后，中原地区各部落联盟之间经过长期的战争和联合，先后出现过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这几个强有力的部落联盟首领，他们同邻近的部落联盟“三苗”和“九黎”之间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战争。

约公元前22世纪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时代。

在部落联盟之间的长期战争中，逐渐在部落联盟内部形成了军事民主制度。平时执行公共事务、战时负责指挥作战的军事首领（即部落联盟首领）是经过部落联盟议事会推举出来的，军事首领和部落显贵都是议事会的参加者。《尚书》中记载的尧、舜“咨四岳”，可能就是在举行部落联盟议事会，所说的“四岳”，可能就是部落显贵中的四位有权势的元老人物。部落联盟议事会有权推举军事首领，据史书记载：尧老了把帝位让给舜，舜老了把帝位让给禹，史称“尧、舜禅让”，作为“让贤”、“以天下为公”的美谈；实际上尧、舜、禹都是经过部落联盟议事会推举出来的，尧推荐舜、舜推荐禹之后，是经过以“四岳”为代表的部落联盟议事会的同意和推举拥戴才继承首领地位的。“尧、舜禅让”的传说，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时代军事民主制的历史内容。

随着氏族部落之间掠夺战争的频繁，部落联盟的首领和氏族显贵们，掠夺到越来越多的财富、奴隶和土地，同时他们的权力也越来越加强，因而他们的地位凌驾于氏族成员之上，逐渐形成为奴隶主阶级。反之，广大氏族成员的地位却日益下降，有的成为平民，有的沦为奴隶，因而在氏族公社内部出现了奴隶和奴隶主这两个对立的阶级。随着阶级的产生，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之间的阶级矛盾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了。于是，“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自己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从此，氏族部落组织逐渐转变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暴力统治产生了，军事民主制也随之而瓦解，部落联盟军事首领不再由部落联盟议事会推举出来，他们转变为世袭的国王，原始社会宣告解体，阶级社会开始产生了。我国历史传说中的夏禹，就是从军事民主制转变为世袭制的过程中一位关键人物。

〔奴隶社会〕(公元前21世纪至前476年)

夏(约公元前21——16世纪)

约公元前21世纪初 夏朝建立。

夏族原来是活动在黄河中游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一带的氏族部落。原始社会末期，夏部落即夏后氏与有扈氏、斟寻氏、有男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十一个姒姓近亲部落结为部落联盟。传说这个部落联盟首领鲧曾奉尧之命治水无功，为尧所杀，可见以夏后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是附属于尧、舜所领导的更大的部落联盟的。传说鲧之子禹因治洪水有功，被推举为尧、舜之后中原地区强大部落联盟的首领。这时从军事民主制过渡到世袭制的条件已经成熟，禹已经掌握独行独断的专制权力，据史籍记载：“禹朝诸侯之君于会稽之上，防风氏之君后至，而禹杀之。”禹死后，按照军事民主制惯例，一部分氏族贵族推举伯益继承禹位，但是更多的氏族贵族却一致赞成以世袭制代替军事民主制，拥戴禹的儿子启为国王，经过斗争，启杀掉益取得王位，后来又灭掉反对世袭制的有扈氏，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王位世袭制宣告确立。夏朝初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后徙平阳（今山西平阳）、安邑（今山西安邑）、晋阳（今山西太原），夏朝的势力已扩展至黄河中下游一带。夏朝从禹到桀（履癸），传十六王，十三代，共四百余年。

约公元前21世纪后期 后羿代夏；少康中兴。

夏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终日宴饮田猎，不理政事，残酷地压榨奴隶和平民，引起阶级矛盾的激化。东夷部落首领有穷氏后羿乘太康出外田猎之机，率兵攻入夏朝都城，利用人民的不满，“废太康，因夏民以代夏政”，夺取了夏朝政权。不久，后羿又为他的亲信寒浞所杀，由寒浞执掌政权。后来夏启的曾孙少康逃到有虞氏部落，经过十余年间积蓄力量“有众一旅”，并联合夏的遗臣和近亲诸侯国，共同出兵灭掉寒浞，重建夏朝，史称“少康中兴”。从此以后，夏朝的统治基本稳定下来。夏朝时期，奴隶制国家粗具规模，建立了政权机构，分成“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三个部门，有牧正、车正、陶正等官，并设立了常备军，制定了刑法。同时，经济文化也有了初步的发展，为商、周时代奴隶制国家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打下基础。

商(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十一世纪)

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 商汤灭夏。

夏朝后期，政治日益腐败，加上连年征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逐渐尖锐起来，史称夏王孔甲“好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孔甲三传至夏桀，更是暴虐无道，大兴土木，修建宫室，连年征伐，破坏生产，百姓怨声载道，指着太阳骂道：“时日（指夏桀）曷丧（还不快些垮台），予及汝偕（同）亡！”表示宁肯和他同归于尽，也要同他展开坚决的斗争。正在奴隶、平民纷纷起义之际，东方的商族兴起，利用这个时机发展势力，灭掉夏朝。

商族原是居住在黄河下游即今河南东部及山东一带的氏族部落，相传商的远祖名契，尧舜时曾有过大功，这说明商部落从很早以来就是尧、舜、禹部落联盟的成员。传到王亥时，农业和畜牧业都有很大的发展，所以古史有“王亥服牛”的记载，开始出现私有财产。七传至成汤（太乙）时，商族进入阶级社会，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以毫（今河南商丘）为根据地，乘夏朝衰弱之际向黄河中游地区发展势力，采取先攻取夏外围的诸侯、部落，然后灭夏的办法，首先攻灭了葛（今河南宁陵葛乡），接着攻灭了荆、温（今河南温县）等十几个部落和诸侯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后来又攻灭夏的与国韦（今河南滑县），顾（今

山东范县）、昆吾（今河南浚县），然后一举灭夏，把夏桀流放在南巢（今安徽巢县），夏朝宣告灭亡。成汤灭夏以后，建立起商朝，都于毫。自成汤开国自纣王亡国，传三十一王，十七代，历时六百余年。

约公元前十四世纪 盘庚迁殷。

从商汤建立商朝后，传二十王至盘庚，曾经迁都五次：仲丁由毫迁臯（即今河南荥阳东北），河亶甲由臯迁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由相迁耿（今河南温县东），南庚由耿迁奄（今山东曲阜），直至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殷墟）才最后固定下来，从此以后二百七十余年“更不徙都”。商朝前期经常迁都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商朝统治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常受洪水泛滥的威胁，容易造成水旱灾；另方面也同当时政治局面不稳定、统治不巩固有关系，除了阶级矛盾之外，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非常剧烈，从仲丁至阳甲之间，接连“九世之乱”，统治局势的不稳定，影响到统治中心的不稳定。盘庚迁殷以后，“行汤之政”，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使动荡不安的局势稳定下来，从而扭转了“荡析离居，罔有定极”这种迁徙无常的局面。武丁继之，“修政行德”，“殷道复兴”，对经常侵扰商朝的鬼方、土方、孟方、舌方、羌方等部落和方国进行征伐，把商的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东至辽海、西至渭水、南至江、淮、北至燕山、河套的广大区域，成为当时世界上强盛的奴隶制国家。

盘庚迁殷后，在政治上出现的长期安定局面中，奴隶制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当时已发明牛耕，农具和农作物的种类也日益增多，农作物品种有麦、黍（大麦）、稷、黍、穄（稻）、桑、麻等。马、牛、羊、鸡、犬、豕已成为普通的家畜。手工业的分工较细，有专门的制铜、制骨、制陶、石工、皮革、酿造、纺织、舟车等手工业作坊，规模都较大。代表商代奴隶制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水平的，有司母戊鼎和甲骨文。司母戊大方鼎重875公斤，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是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也是目前我国已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这个大方鼎花纹精致，雄伟壮丽。铸造这样的大鼎，需要有大规模的作坊、复杂的分工和精湛的技术，估计需要二、三百人的集体操作才能完成。它充分体现了商代青铜器制作的高度发展水平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量。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商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它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故称为甲骨文；又由于主要是占卜用的，所以又称为卜辞。在已经发现的十多万片卜辞中，所用单字数目大约已有三千五百个左右，现在能认识出来的约一千多字。甲骨文已经具有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从文字结构上考察，后代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的原则都已具备，形声、会意、假借等比较进步的方法都已普遍应用；尤其形声字比较复杂，是由形符和音符结合成字，形符表意，声符表音，是汉字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这表明我国汉字经过长期发展，到了商代后期已经达到基本成熟的阶段。

然而商代灿烂的奴隶制文明，是在广大奴隶群众辛勤劳动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商朝时期，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发展，奴隶来源更加扩大，除本族人民在阶级分化过程中沦为奴隶而外，被征服的部落或方国的人民也大量地被罚为奴；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奴隶劳动的使用也更为广泛，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的基础。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被称为“众”或“众人”，他们被编制在“井田”（用水渠和田埂划成的方田，名义上属于王即奴隶制国家所有，实际上由商王分给各级贵族，归奴隶主贵族所有）之上，从事大规模集体劳动。从事手工业的奴隶被称为“工”，家内奴隶则有“臣”、“妾”、“仆”、“奚”等名称。他们被看成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奴隶主贵族的私人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屠杀，也被用以祭祀鬼神

或殉葬，在已发现的商代墓葬中，殉葬奴隶竟有达数百人的。在残酷的剥削、压迫下，奴隶大众奋起反抗，举行暴动、起义。在甲骨文中就有不少“丧众”（奴隶逃亡）、“告众”（奴隶暴动）和“王途众人”（商王率军镇压奴隶起义）的记载，说明商代奴隶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一直是很激烈的。

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1年）

约公元前11世纪 武王伐纣和西周建立。周公东征和周初分封。

商朝末年，政治越来越腐败，最高统治者商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终日骄奢淫逸，人民的负担日趋沉重，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到了商代最末一代的国王纣王帝辛时，统治危机达到了极点。纣王曾经征伐东夷，把商朝的政治势力和经济文化扩展至江、淮地区，对后来东南地区的开发有过一定的影响；但是纣王却是一个非常荒淫残暴的君主，为了享乐，在首都朝歌大修宫殿园池，又在各地兴修离宫别馆，并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因而更加重人民的负担，对广大奴隶、平民进行了敲骨吸髓般地残酷剥削和压迫，“内厚赋敛，暴虐百姓”，“厚赋敛，以实鹿台之财，而盈巨桥之粟”。他还用严刑酷法如“炮烙之刑”来屠杀奴隶和平民，并放纵一些助纣为虐的亲信大臣崇侯虎、恶来、费仲等为非作歹，而疏远甚至诛杀一些向他纳谏的臣僚（如比干、微子、箕子等），因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小民方兴，相为仇敌”，奴隶、平民的暴动、起义越来越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商朝统治已面临全面崩溃的境地，于是，商的属国周国遂乘机灭掉商朝。

周族原是居住在黄河上游渭水流域的古老部落，与附近的姜姓羌族部落有密切的姻亲关系。相传周的远祖弃居于于邰（今陕西武功），姓姬氏，在尧、舜时当过农官，教民播种五谷，因名后稷。传至公刘时迁居豳（邠）（今陕西栒邑），部落逐渐兴旺，开始向奴隶制过渡。到古公亶父（周太王）时，因受附近戎族侵扰，又迁居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国号为周。周和商早就建立了臣属的关系，接受商朝所封周侯的封号。古公亶父死后，其少子季历（王季）继位，打败西方戎族，势力日益大。到了季历之子姬昌（周文王）时，一面提倡农业，积累经济军事力量；一面用武力征服附近的方国崇（今陕西西安附近）、黎（今山西黎城）等，开始翦（灭）商的准备，并迁都于丰（今陕西长安县），趁纣王东伐淮夷之机，向东发展势力，文王晚年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商纣王封之为西伯。文王死后，其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周武王迁都于镐（在丰的附近），在周公旦（武王之弟）、太公望（即吕尚，姜姓）的辅佐下，积极准备灭商。武王九年，大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县），争取伐商的盟国。武王十一年冬，大举伐纣，自率兵车三百辆，“虎贲”（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孟津，会合众诸侯之兵，并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部落，向商都朝歌进军，武王在牧野（今河南汲县）誓师，纣王纠集大军仓皇应战。纣兵虽多，如古史所说：“殷商之旅，其众如林”；但多是由奴隶、平民组成，不愿为纣王卖命，在阵前起义，掉转戈头，帮助周军，史称“前徒倒戈”。周军攻入朝歌后，纣王自焚而死，商亡。

周朝建立后，定都于镐（今西安市西南），至东迁为止，史称西周。周灭商后，封纣子武庚为诸侯，居殷商归都，统治殷地遗民，另派武王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监视武庚，称为“三监”。不久，武王病死，其子成王姬诵继位，年幼，由武王弟周公摄政，管叔、蔡叔、霍叔对周公摄政深为不满，散放周公将要篡夺王位的流言。武庚和商朝旧贵族乘周朝统治

集团内部不和，便勾结管叔等“三监”和东方的奄（今山东曲阜）、蒲姑（今山东博兴）徐夷、淮夷等发动叛乱。周公在取得大臣吕尚、姬奭（召公，周之同宗）的支持后，率兵东征，经过三年的时间，平定了叛乱，杀武庚、管叔，流蔡叔、霍叔。平叛之后，为了巩固周朝统治，一方面把参加武庚叛乱的殷商遗民（主要是奴隶主贵族）集中居住在洛水北岸，在此修了一座成周（今洛阳东）城，作为东都，派八师（每师二千五百人）入驻，监视殷人，并作为控制关东地区的据点。另方面则进行分封诸侯，分别镇守原来商朝统治的东方各地。在周初分封（包括武王时分封国）诸侯中，据《荀子》记载：“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占五十三人”，周王的宗族子弟占了过半数，同姓国中以鲁（周公长子伯禽所封）、卫（周公之弟康叔所封）、晋（武王之子叔虞所封）、燕（周王同族召公之后）为大；其余异姓诸侯国，多是分封功臣和旧贵族，其中以齐（姜尚所封）、宋（纣王庶兄微子所封）为大。这样，在奴隶主贵族内部就形成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构成的等级制度，他们构成了奴隶主统治阶级；其下的平民和奴隶则是被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以周王为首的奴隶制下的等级制度，周初又利用血缘关系制定了宗法制度，即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分为大宗、小宗，周王既是政治上的共主，也是宗法的宗主，这样就把政治关系同血缘关系结合起来，以加强周王对诸侯国的统治。除了分封而外，相传周公还曾经“制礼作乐”，按照奴隶社会等级制、宗法制下的上下尊卑关系制定出各级奴隶主贵族的行事规范，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在行礼仪式上，不同的礼，演奏不同的乐章，它是用来维系等级名分、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

约公元前11世纪后期至10世纪初 西周的鼎盛时期——“成康之治”。

周武王去世后，由周公摄行政事，周公摄政七年，成王年长，周公还政与成王。成王死后，其子康王钊继位。成康之世，是西周的极盛时期，政局比较稳定，史称“成康之治。”

西周时期，奴隶制政治制度趋于完备，奴隶制经济文化也在商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虽然还普遍使用石器、木器、骨器和蚌器，但从考古发掘看来，这时已开始金属工具，有青铜制的锄、铲、斧、锛等，同时还采用了更好利用土地的休耕制，奴隶数量也有很大的增加，在水利灌溉上较之过去也有不少的进步，因而农业生产的品种和产量都比商代增多。手工业方面也是如此，周代的青铜器制造和制陶业在商代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纺织、木工、金工、漆器、玉器、皮革等行业也比过去进步。西周的工商业由官府经营，工匠和商人多是奴隶，称为“工商食官”。

西周时代，作为奴隶制经济基础的井田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周与商代一样，名义上都是土地王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奴隶主国家所有制，但实际上由周王分与各级奴隶主贵族，归他们所有。井田名义上属于公田，不得任意买卖，即所谓“田里不鬻”。周代井田比起商代有了比较完整的灌溉系统和比较准确的亩制。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被称为“庶人”。周代奴隶主贵族通过占有井田来剥削庶人。井田制把土地用灌溉的水沟划为面积相等的耕地，每一方块是一百亩（周亩折合今亩0.214亩），是当时每家农户（以一夫为单位）的耕种面积，九个方块合成一井。井田中有纵横交错的水沟和道路，如遂、沟、洫、川都是水沟，径、畛、涂、道、路都是道路，也叫阡陌。井田区划的划分，一方面便于组织奴隶劳动和灌溉，同时也是因为划成一定面积可以作为计算官吏俸禄的单位。耕种井田的庶人住在城外的邑里，由奴隶主贵族派“田畯”监督劳动。奴隶大众的生活非常痛苦，他们同牛、马一样地在市场买卖，还要为奴隶主殉葬，受尽剥削和压迫，因而西周时期不断爆发奴隶的反抗斗争。

前841年（共和元年） 国人暴动，共和行政。

西周后期，在奴隶主贵族的残暴统治下，随着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剥削、压迫的日益加深，阶级矛盾即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以及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到了周厉王时，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起来。周厉王非常贪婪暴虐，为了搜刮更多的财富，任用大臣荣夷公实行专利，下令把国人可以自由使用的山林川泽之利收归王有，禁止他们使用，结果引起以平民为主体的国人的愤怒，到处议论纷纷。厉王认为这是对他的诽谤，命令从卫国召来一些巫师监视国人，严禁议论。大臣召公进谏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厉王不听。国人对厉王的暴虐忍无可忍，终于在前841年发起了暴动。厉王狼狈逃窜，出奔彘邑（今山西霍县）。在厉王出奔期间，大臣、诸侯推举周公、召公（周初周公旦、召公奭之后裔）共同执政（另一说法是推举共伯和执政），历史上称为“共和行政”。共和元年是我国历史有不间断的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十四年，厉王病死于彘邑，大臣迎太子静即位，是为宣王，共和行政才宣告结束。

前771年（周幽王十五年） 西周灭亡。

周宣王统治的前期，“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曾经打败𤞤狁和西戎，史称“宣王中兴”；但是到了宣王统治的后期，在同戎族的战争中多次失败，“乃料民于太原”，企图重整军队，结果加重了人民的赋役负担，国势渐衰。宣王死后，其子幽王继位，昏庸无道，再加上关中地区连年发生地震、旱灾，人民四处流亡。在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又相继爆发。据历史记载：周幽王宠爱偏妃褒姒，废掉王后申后和王后之子太子宜臼，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引起诸侯的不满，申后之兄申侯更是愤恨。前771年，申侯联合缯（今河南方城）侯引犬戎（西戎之一支）进攻西周，杀周幽王于骊山（今陕西临潼县东）之下，西周灭亡。从武王至幽王，传十一代，十二王，历时二百五十七年。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至476年）

前770年（周平王元年） 周平王东迁。春秋时代开始。

春秋本为鲁史之名，孔子在鲁史的基础上修《春秋》，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周平王43年）至鲁哀公14年（前481年，周敬王39年）之间的历史，后人根据这部著作的起讫时间称之为“春秋时期”。为了便于同西周、战国衔接，现在一般采取以西周灭亡的第二年即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为春秋时期的开始，而以《史记》所记战国开始那年即周元王元年（前475年）的前一年即周敬王44年（前476年）为春秋时期的结束。从东周王朝而言，春秋时期是东周的前半期，战国时期是东周的后半期。

西周灭亡的第二年，周幽王之子平王宜臼在晋文侯、郑武公等诸侯的拥戴下即王位，因为镐京残破，东迁洛邑（今洛阳），是为东周，由此揭开春秋时期历史的序幕。平王东迁以后，只有洛阳附近一隅之地，王室衰微，号令不行，而有些诸侯国（如齐、秦、晋、楚、吴、越）却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军事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从兼并小国中逐渐强大起来，它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互相雄长，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在大国争霸中，包括四周由少数民族（即“蛮”、“夷”、“戎”、“狄”）建立的小国或部落多数被齐、秦、晋、楚各大国所兼并，到了春秋末年以后逐渐和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融合，原来华“夷”之间的界限逐渐泯灭了。与此同时，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主要是铁器的使用），私田不断扩大，公田不断萎缩，奴隶、平民的反抗斗争也日趋激烈，出现了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和代表它的新兴势力，接着，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和新兴势力的壮大，产生了新旧势力的夺权斗争。到了春秋末年，在奴隶、平民起义动摇奴隶主统治的基础上，新兴地主阶级终于在齐、晋等主要国家夺取了政权。经过战国初期的变法运

动，封建政权先后在各诸侯国确立起来。所以春秋时代是大国争霸时代，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先秦时期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前719—710年（周桓王元年至十年） 郑庄公图霸。

春秋初年，首先起来争霸的是郑庄公。郑国（今河南中部郑州一带）是周宣王弟郑桓公（名友）之后。郑庄公曾经打败宋（今河南商丘一带）、卫（今河南淇县一带），制服陈（今河南淮阳一带）、蔡（今河南上蔡一带），攻破许（今河南许昌一带）国，还战胜了北戎，曾威风一时；但终因郑国新建不久，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国内又有矛盾，因而在开创霸业上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未能成为中原的霸主。

前685—643年（周庄王十二年至周襄王九年） 齐桓公创霸。

齐国是东方的大国。春秋初年，齐灭纪、郕（皆在今山东中部），并多次联合郑国制服宋、卫等国。685年，齐桓公（名小白）即位，任用法家先驱人物管仲为相，进行政治改革，奖励农业生产，发展工商业，国势富强，兼并了一些小国。当时楚国在兼并汉水流域的一些姬姓国家（“汉阳诸姬”）后，又灭掉申（今河南南阳）、息（今河南息县）、邓（今河南邓县）等国，陈、蔡也表示屈服，图谋北上争夺中原霸权。管仲向齐桓公建策，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展开争霸活动。首先帮助燕国打败山戎（今河北东北部），接着又打败狄人（居今山西、河北一带的少数民族），“存邢（今河北邢台）”、“救卫”。前656年（周惠王二十一年）齐桓公联合鲁、卫、宋、郑、陈、许、曹各国侵蔡伐楚，至于召陵（今河南郾城），责问楚国不向周王纳贡之罪，楚国见八国军容甚盛，只得答应向周王纳贡，并和齐结盟，暂时停止北上。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其中前651年的“葵丘（今河南兰考）之盟”，声势最为浩大，周王也派人参加，每次盟会都由齐国主盟，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霸主。齐桓公死后，诸子争夺权位，因而霸业未能继续下去。

前684年（周庄王十三年） 齐、鲁长勺之战。

齐桓公与其兄公子纠争位时，鲁庄公曾帮助公子纠，所以这年齐桓公伐鲁，兴兵问罪。齐、鲁两军战于长勺。当时齐强鲁弱，鲁人曹刿劝鲁庄公采取“敌疲我打”的战术，伺齐军锐气衰竭之际，一举击败齐军，创我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先例。

前641年（周襄王十一年） 梁国“民溃”。

这年，梁国（今陕西韩城南）国君强迫庶人（奴隶）筑城，庶人已经疲惫不堪，又强迫他们挖壕沟，激起庶人的反抗，举行暴动，秦国乘机灭掉梁国。

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 楚、宋泓之战。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图谋继齐称霸中原，这时楚国的势力重新北向，双方在争夺霸权上发生了矛盾。前638年，宋伐郑，楚救郑，两军大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北三十里）。宋国司马子鱼建议宋襄公乘楚军渡河未毕，攻其不备，宋襄公不许。楚军渡河后尚未成立，子鱼又建议发动进攻，宋襄公还是不许，认为君子不应乘人之危。结果错过有利时机，宋军大败，宋襄公伤重而死，霸业未成。

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 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称霸。

晋国在春秋初年原是个长期内乱的中等国家。前678年，晋武公统一晋国。到他的儿子献公时，扩大军事力量，先后灭掉耿（今山西河津）、霍（今山西霍县）、魏（今山西芮城县）、虢（今河南陕县）、虞（今山西平陆）等同姓国，后来又占有秦的河西地，晋国开始成为北方的强国。献公死后，诸子争立，晋国又重新陷于内乱之中。后来献公子惠公即位，为秦所败，在前645年“作爰田”，“作州兵”，把一部分土地赏赐给有军功的人，为军功赐

田之始。前636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晋公子重耳（献公子，惠公兄）在秦国帮助下回到晋国，杀掉惠公之子怀公，继立为晋君，是为晋文公。晋文公任用贤臣赵衰、狐偃等，整顿内政，发展生产，国势复兴，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富强局面。前635年，周王室发生内乱，晋文公采纳狐偃的举霸业必先勤王的建议，出兵帮助周襄王平定了叛乱，周襄王赐以阳、樊、温、原和横茅之田（今河南济源、武陟一带）既扩大了领土，又提高了在诸侯中的威望。于是，出兵南下，和楚国争夺霸权。前633年，楚围宋，宋求救于晋。晋军先去攻打楚的盟国曹、卫，以所占有的曹、卫土地送与宋国。楚派使臣告诉晋国：请晋军撤出曹、卫，楚军撤出宋国。晋国为了激怒楚国，唆使曹、卫叛楚从晋，又拘留楚使。楚军大将子玉果然恼怒，决心与晋军决一死战。前632年，晋联合齐、秦、宋与楚军大战于城濮（今河南濮县），楚军大败。这年冬天，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荥阳东北），朝见周王，周襄王封晋文公为“侯伯”，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

前627年（周襄王二十五年）秦、晋殽之战。

前628年晋文公死去，秦穆公乘机图霸（秦国，嬴姓，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平王东迁，秦襄公护送有功，被封为诸侯，并赐以西土之地。后来秦武公又兼并了渭水流域的一些小国，至穆公时，秦已成为西方大国）。前627年，秦穆公派兵偷袭郑国，因郑国有备，灭滑（今河南偃师）而还。晋襄公为维护霸业、派大将先轸埋伏殽山（今河南渑池、洛宁一带）两旁，等候秦军经过时发动突然袭击，秦军大败，晋国继续维持霸主地位。

前624年（周襄王二十八年）秦穆公称霸西戎。

殽之战秦军受挫后，东进图霸为晋所阻，秦穆公乃转而向西发展，“益国十二，遂霸西戎”，成为西方的霸主。

前597年（周定王十年） 晋、楚邲之战，楚庄王称霸。

楚国是春秋时代的南方大国。楚的远祖熊绎，周初有功，封于楚，初居丹阳（今湖北枝江）。到了春秋初年，楚武王、楚文王兼并江汉间诸小国，又北上灭掉申、息、邓，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附近），国势强盛。传至楚成王时，北上与齐、宋、晋争霸中原。城濮之战楚军失败后，晋文公、晋襄公相继称霸，楚国未能与晋交锋，只得向东发展，先后灭掉江（今河南汝宁）、六（今安徽六安）、蓼（今河南固始）诸小国。到了楚成王之孙楚庄王时，整顿内政，平息内乱，国势复振，遂北上与晋争霸。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今洛阳以南）观兵于周郊，派人向周王问九鼎之轻重，有代周之意。前598年，楚庄王乘陈国内乱、出兵攻破陈国都城。第二年（即597年）又出兵攻郑，晋派大将荀林父率领大军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邲（今河南郑州北）由于将帅不和，被楚军打败，中原郑、宋诸国都朝贡于楚，于是楚庄王称霸中原。

前594年（周定王十三年） 鲁国“初税亩”。

这年，鲁国“初税亩”，即按田亩多少征收赋税，正式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这是封建制成长，井田制逐渐崩溃的重要标志。

前590年（周定王十七年） 鲁国“作丘甲”。

继“初税亩”之后，这年鲁国又宣布“作丘甲”，即规定按照占有田亩多少，出人服兵役，编成军队，进一步从军事制度上巩固土地私有制。

约前571—？（周灵王元年）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在世。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东）人，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据《史记》记载，老子早年作过东周王朝掌管图书的官吏，

相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前516年周朝发生内乱，老子失去职位，离开东周，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附近的函谷关），前往秦国，后来客死于秦。死后谥为聃，所以又称老聃，著有《老子》一书，共八十一章，五千余言（字），系用韵文写成，全书内容多言道，兼言德，故又名《道德经》。

老子学说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第一是以“道”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即认为无是世界万物的根源。他所说的“道”，是一种“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无物之象”，也就是虚无，虚无就是“道”的本质。他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说从虚无中产生统一的物质世界。这种虚无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第二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认识到事物总的根源“道”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即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运动着和发展着，有了初步的运动、发展的观点。他发现了事物的对立面即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就是他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他还发现了事物的对立面即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规律。这就是他所说的：“正复为奇（正面随时可变为反面）善复为妖（好事随时变为坏事）；”“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这些辩证法思想，对于促进古代人们思想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是老子哲学思想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第三是“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思想。老子看到春秋时代“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因而把人民反抗暴政的原因归结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作为太多，压榨、剥削老百姓。他还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因而除提倡“无为而治”之外，还主张实行愚民政策。他理想中社会是国小民少、人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能实现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这反映出老子的倒退的历史观和消极的人生观。

前562年（鲁襄公十年） 晋会诸侯于萧鱼（今河南原武），晋悼公复霸。鲁作三军。

晋悼公名周，襄公曾孙。晋国自文公创霸后，其子襄公继霸，597年晋楚邲之战，楚庄王大败晋军，成为霸主。晋悼公即位后，在政治上军事上作了一番整顿，国势复兴，曾以盟主身分多次和诸侯会盟，“七驾（会盟七次）而楚莫能与之争”，萧鱼之盟就是“七驾”中的一次。

这年，鲁国季孙、孟孙、叔孙三分公室，作三军，各得一军。

前551—479年（周灵王二十一年至周敬王四十一年）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世。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附近）人，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年轻时作过小吏，后来任鲁国司寇之职，主张张公室，抑私家，晚年周游列国，不为列国国君所用，乃返鲁国，从事教育和文献典籍整理工作，他生平言行由弟子记录下来，辑为《论语》一书，在封建社会里成为儒家主要经典之一。

由于孔子生活在新旧斗争激烈的春秋晚年，因而在他的学说思想中带有两面性，既有守旧的一方面，也有维新的另一方面。比如在天道观方面，他既相信“天命”，说什么“五十而知天命”，但又强调人事的重要，说什么“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要人们“敬鬼神而远之”。作为他的学说思想主要部分的“仁”和“礼”也是这样。他很重视周礼，把西周社会看成是理想社会，说什么“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对于礼也是有损有益，也有“从众”的地方。仁的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的意义就是“爱人”，认为只有贵族才具备“仁爱”思想，“未有小人而能仁者也。”这种美化统治阶级的论调，目的在于欺骗劳动人民，企图用此缓和阶级矛盾，消除人民的反抗思想。但是仁的思想的提出，适应了奴隶群众要求解放的新潮流，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在政治观点上，他既主张张公室，抑私家，维护旧贵族利益；又反对旧贵族的横征暴敛，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提出“为政以德”的“德